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核心差异与当代融合路径

张瑞颖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要

自然哲学作为人类认知自然、定位自身的核心思想载体, 深刻塑造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与人与自然的互动模式。本文以文献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为核心, 系统梳理东西方自然哲学的起源基础与核心内核, 深入剖析二者的核心差异、历史局限与当代互补性。研究发现, 东方自然哲学以五行论为起源, 以“天人合一”为核心自然观, 强调整体归纳与和谐共生; 西方自然哲学源于古希腊伊奥尼亚派的元素本原说, 以“天人相分”为核心, 注重理性还原与利用。二者在认知逻辑、价值导向与实践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 但亦具有鲜明的当代互补性: 东方的和谐内核可修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西方的理性精神能弥补东方思想的不足之处。基于此, 本文提出构建现代自然观应实现“天人合一”和谐内核与“天人相分”理性精神的交流互鉴, 立足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性, 为当代生态危机的化解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

东西方自然哲学, 天人合一, 天人相分, 核心差异, 当代融合

The Cor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Integration Paths

Ruiying Zha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As the core ideological carrier for humankind to perceive nature and define self-positioning, natural

文章引用: 张瑞颖.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核心差异与当代融合路径[J]. 哲学进展, 2026, 15(9): 8-16.

DOI: 10.12677/acpp.2026.159413

philosophy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mode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dopting literature-based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as primary method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origins and core connotation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ir pivotal discrepancie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complementari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Ea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originated from the Five-Elements Theory and centers on the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t lays emphasis on holistic induc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e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derives from the elemental ontology of the Ionian School in ancient Greece, takes the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as its core, and prioritizes rational reduction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e. Marked disparities exist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in cognitive log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influences, while they feature prominent contemporary complementarity. The harmony-oriented essence of Eastern thought can rectify the anthropocentric tendenc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Western rational spirit can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in Eastern ideology.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view on nature ought to realiz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he harmonious essenc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 rational spirit of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umans should exert subjectivity while abiding by natural laws,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resolving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es and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Eastern and Western Natural Philosophy,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epar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Core Differences, Contemporary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然哲学作为人类认知自然本质、定位自身存在的核心思想载体，贯穿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深刻塑造了不同文明的思维范式、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从东方先秦时期确立的“五行”起源论到儒家、道家共同秉持的“天人合一”自然观，从古希腊伊奥尼亚派的元素本原说到近代西方主导的“天人相分”理念，东西方对自然的认知形成了两条看似迥异却又相互关联的思想脉络。进入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凸显，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重思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内核，厘清二者的核心差异与内在关联，挖掘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理论层面，通过系统梳理东西方自然哲学的起源逻辑、核心特征与发展脉络，能够丰富跨文明哲学比较研究的内涵，打破单一文明视角下的认知局限，为自然哲学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框架。实践层面，东方“天人合一”思想中蕴含的和谐共生智慧与西方“天人相分”理念催生的理性改造精神，为化解当代生态矛盾、平衡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二者并非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具有互补性的思想资源，其交流互鉴能够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学精神的实践方案。

2.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起源与核心内核

2.1. 东方自然哲学的底色

东方自然哲学的起源论以“五行论”为核心标识，其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土壤。早在周幽王时期，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构成万物的“五行”观念基本确立，这一理论并非抽象的思辨产物，而是源于对地上万物的直观观察与经验归纳。《尚书·洪范》中明确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1]这段文字精准概括了五行的基本属性与功能：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其味为咸；火具有燃烧向上的特性，其味为苦；木具有可曲可直的特性，其味为酸；金具有可锻造变革的特性，其味为辛；土具有孕育农作物的特性，其味为甘。五行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遵循着相生相克的运行规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相生关系与“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相克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自然系统，揭示了世界不停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

五行论的思想穿透力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更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了一个涵盖医学、色彩、方位、伦理等多维度的认知体系。在医学领域，《黄帝内经》将金木水火土的属性与人体五脏的特点相结合，提出五脏相生相克的理论，主张根据五脏的五行属性辨证施治，通过调节人体与自然的平衡来维持健康，构建了“医哲同源”的独特医学体系。在色彩与方位领域，五行与五色(白、青、黑、红、黄)、五方(西、东、北、南、中)形成了固定的对应关系，《周礼·考工记》中“东方谓之青，西方谓之白，南方谓之赤，北方谓之黑，地谓之黄”的记载，正是这种关联的集中体现^[2]。儒家进一步将色彩与“仁”“德”“善”等道德规范相联系，认为色彩之美在于其能够暗示人的美德，这种类比思维在戏剧脸谱中得到了生动展现，红色象征忠勇、黄色象征刚猛、黑色象征刚直不阿、白色象征奸诈阴险，形成了中国独有的色彩伦理文化。道家则秉持“五色生于无色”的观点，追求自然的朴素之美，将黑色和白色视为道的象征色彩，主张“有无相生”，认为黑白高于五色，体现了对自然本真的尊崇。佛教“色即是空”的理念与道家“无”的思想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东方“色”的哲学特征，凸显了对万物无实体性的认知。

东方自然哲学的核心自然观以“天人合一”为主旨，这一思想根源于《易经》，并在儒家、道家的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成为贯穿东方哲学的核心线索。儒家之“天”既是自然界的统称，也是道德之天、价值之天，主张人应当敬畏天命，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儒家走的是一条由人之天的“天人合一”道路，试图将自然界事物与人相勾连，在方法论上采用类比外推的思维方式，其中庸之道体现在生态问题上便是对万物取用有节制，性善论则外化为“爱物”的生态结论。孔子提出“人贵物贱”，这里的“贵贱”并非指地位高低，而是强调人在自然中“参赞化育”的责任，认为人是自然界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虽非绝对主宰，却肩负着维护大自然生生不息秩序的特殊使命^[3]。荀子主张天人各司其职，不能将人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但可以通过对社会秩序的安排实现对自然的认识和制约，进一步丰富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道家思想以“道”为根本范畴，“道”具有最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本体论层次上对世界本原的描述，由此开出的生态思想具有鲜明的本体论意义。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人与自然是整体，同是道化的表现形式，万物的存在相对于道无贵贱之分，人类只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份子，不具有道德优先地位。庄子取消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道义基础，从本体论出发确认万物所拥有的不受干扰的自由，主张人不能忽视自然界的本性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万物，“道通为一”的一元本体论指导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元论的，展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与现代追求的小范围

生态共同体不谋而合，庄子的境界论则从个体生命体悟出发解读生态问题，为生态哲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儒家与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虽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对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构成了东方自然哲学的核心价值取向。

2.2. 西方自然哲学的底色

西方自然哲学的起源论可追溯至古希腊的伊奥尼亚派，其核心特征是主张地、水、风、火四大元素中某一元素为主宰，其他元素则是该主宰元素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态，这种单一主宰的元素本原说与东方多元素并列相生相克的五行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利斯率先提出“水本原说”，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他之所以持有这一观点，一方面是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原料，热气本身从湿气里产生并靠湿气维持；另一方面是因为万物的种子都具有潮湿的本性，而水正是这种潮湿本性的来源。泰利斯的观点开启了西方哲学对自然本原的理性思辨，将自然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奠定了西方自然哲学的思维基础。

赫拉克里特则提出“火本原说”，认为“世界秩序不是任何神或人创造的，是永恒的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和熄灭”。在他看来，火是世界的本源，火与万物的循环本质上是火的运动过程，火在不同环境中可以演变为气、水、土等不同形态，这种观点强调了自然的运动性与变化性，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阿那克西美尼进一步提出“气本原说”，认为“气的形状在最平稳的状态时看不到，在热、冷、潮湿的运动中通过浓聚和稀疏表现出区别：发散而稀疏时成火，浓聚成风，凝结变云，再凝结成水，更高程度的凝结形成大地；气浓缩到最密集时为石”。这一理论进一步细化了元素之间的转化机制，体现了西方哲学对自然规律的理性探究精神。古希腊伊奥尼亚派的元素本原说虽观点各异，但都遵循着“单一主宰－形态转化”的逻辑，注重通过理性思辨追溯自然的终极本原，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轨迹。

西方自然哲学的核心自然观以“天人相分”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这种观念的形成与西方的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西方文明的起点是古希腊工商业城邦，希腊半岛海岸线曲折悠长，形成了许多天然良港，但耕地狭小贫瘠，粮食生产不足，这一地理条件促使古希腊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以获取生活和生产所需的谷物、金属、木材等资源。海外贸易活动的变化莫测与逐利本性，刺激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欲望与实践躁动，人们将身外的自然作为改造的对象加以研究和探索，以期实现对自然的征服，这种对自然征战的意念成为后来“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的理性“种子”[4]。

到了近代，由西方自然条件和基督教文化萌生的“天人相分”观念在理论上日益明朗化，并迸发出强大的实践力量。《圣经》中上帝因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而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让土地长出荆棘，人们必须通过辛苦劳作才能获得食物生存，这一故事蕴含着人类与自然对立的隐喻，即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不断从自然中索取物质和能量，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奋斗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存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代科技的应用与工业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了“征战自然”的辉煌成果，人的主体性在自然系统中不断提升，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自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家们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通过对上帝的否定不断解放人类自身，“上帝死了”之后，人成为仅有的具有灵性或精神的实体，非人类的一切都被视为没有主体性的客体，自然仅仅是实现人类需要的手段和工具。

近代西方哲学进一步强化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归于物质自身，从背离自然走向生态回归，但生态问题纳入哲学视角反而带来了更大的危机。近代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要求摆脱人对自然的依赖，本质上是以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试图安排自然的企图并未改变。这种将人与其外在世界相分离的二元思维模式，直接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最终引发了严峻的生态危机，正如恩

格斯所言：“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现代西方生态哲学中，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激烈争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和自然视为两类完全异质的存在，认为自然物仅仅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存在，道德范围只限于人类之间，人对自然不负有直接的伦理义务，对自然的保护只是出于对自身与他人利益的考虑。自然中心主义则主张自然存在物有其自身意义，不仅仅作为人类利益的相关物而获得价值，伦理范围应当扩大到自然，人类对所有生命甚至无生命存在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这一争论反映了西方哲学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内在困境，也凸显了“天人相分”观念的深层影响。

3.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核心差异解析

3.1. 认知逻辑的差异

东西方自然哲学在认知逻辑上呈现出整体归纳与理性还原的鲜明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二者不同的思维范式与认知起点。东方自然哲学注重对自然现象的整体观察与经验归纳，将自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强调对自然的拆分与还原，而是追求对自然规律的整体把握。五行论作为东方自然哲学的起源论，并非通过逻辑推理或实验验证得出，而是源于对地上万物的直观观察与经验总结，金、木、水、火、土五大元素涵盖了自然界中最基本的物质形态，其相生相克的规律是对自然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关系的概括。这种认知方式不关注单个元素的孤立属性，而是强调元素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整体联动，认为世界的本质在于万物的相互联系与和谐共生。

东方自然哲学的整体思维在“天人合一”自然观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儒家将人与自然、社会伦理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主张“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念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也适用于自然界，通过类比外推的思维方式，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道家主张“道通为一”，认为人与自然同属道的化现，万物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强调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进行分析。这种整体归纳的认知逻辑，使得东方自然哲学更注重对自然的体悟与感知，而非理性的思辨与论证，其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经验性与整体性特征。

西方自然哲学则以理性还原为核心认知逻辑，强调通过逻辑推理与分析，将复杂的自然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基本元素或规律，追求对自然本质的精准把握。古希腊伊奥尼亚派的元素本原说，本质上是一种还原论的认知方式，将万物的本质归结为某一种具体的元素，通过探究该元素的属性与转化规律，来解释整个自然的运行机制。泰利斯的“水本原说”、赫拉克里特的“火本原说”等，都是将自然还原为单一元素的尝试，这种认知方式注重对自然的拆分与分析，试图通过把握单个元素的本质来理解整体的自然[5]。

近代西方哲学进一步强化了理性还原的思维模式，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理性的核心地位，主张通过怀疑与推理来获取确定的知识。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更是将还原论思维推向了顶峰，认为整个自然界都遵循着统一的力学规律，复杂的自然现象都可以还原为简单的力学运动。这种理性还原的认知逻辑，使得西方自然哲学注重对自然的理性探究与实验验证，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但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也容易导致对自然整体联系的忽视，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为后来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隐患。

3.2. 价值旨归的不同

东西方自然哲学在价值导向上的差异，集中体现为和谐共生与具体利用的对立，这种价值导向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人与自然的互动模式。东方自然哲学以和谐共生为核心价值导向，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与相互依存关系，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自然观从根本上否定

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同出一源，同属一个有机整体。儒家主张“敬天畏命”，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强调对自然的适度取用，反对过度开发与浪费，认为人类的活动应当符合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强调顺应自然的本性，不违背自然规律强加人的意志于万物，追求自然的朴素之美与和谐之态。

东方自然哲学的和谐共生价值导向，还体现在将自然与伦理道德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念。儒家将色彩美与“仁”“德”“善”等道德规范相联系，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视为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主张万物无贵贱之分，人类没有权利对万物的存在价值作出评判，应当尊重万物的自然存在；佛教倡导“慈悲为怀”，主张善待一切生命，体现了对自然的关爱与尊重。这种将自然与伦理相结合的价值导向，使得东方自然哲学中的生态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性与实践性，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

西方自然哲学则以利用为核心价值导向，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客体性，认为自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类通过理性与技术可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古希腊时期，海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将自然视为获取资源的源泉，通过对自然的探索与改造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种对自然的征服意念成为西方自然哲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基督教文化中，人类被视为上帝的选民，被赋予了管理和支配自然的权利，《圣经》中“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地位。

近代西方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将自然视为没有灵性的客体，认为人类的价值在于能够将自身意志赋予外界，实现对自然的改造。这种价值导向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这种利用自然的价值导向也导致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平衡，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现代西方生态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论，本质上是对利用自然价值导向的反思与修正，试图在人类利益与自然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

3.3. 对实践的影响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认知逻辑与价值导向，直接决定了二者在实践层面的不同影响，呈现出经验适配与技术革新的鲜明特征。东方自然哲学的实践影响主要体现为与农业文明的高度适配，形成了一套以经验传承为核心的实践体系，渗透于医学、农业、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在医学领域，《黄帝内经》将五行属性与人体五脏相结合，提出了辨证施治的医学理论，通过调节人体与自然的平衡来治疗疾病，这种医学模式注重整体调理与经验积累，与东方自然哲学的整体思维相契合。在农业领域，东方先民们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形成了顺应自然规律的耕作方式，注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经验传承的方式将农耕技术代代相传，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生活方式层面，东方自然哲学的和谐共生理念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五行与五色、五方的关联，使得色彩与方位选择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色彩伦理观念影响了人们的服饰审美与社交礼仪；道家的朴素自然思想则影响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态度，追求简约、自然的生活方式。这种与农业文明相适配的实践体系，注重经验的积累与传承，强调对自然的顺应与适应，在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有效地保障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缺乏对自然的主动改造与创新。

西方自然哲学的实践影响主要体现为推动了技术革新与工业文明的发展，形成了一套以理性思维为核心的实践体系，注重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古希腊时期，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推动了数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技术革新奠定了理论基础；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观念与理性还原思

维，催生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牛顿经典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等科学理论的建立，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对自然的大规模改造与利用，蒸汽机、电力的发明与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在现代社会，西方的技术革新理念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环境保护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的发展，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但同时，西方自然哲学的利用自然价值导向也导致了技术的滥用，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以技术革新为核心的实践体系，注重理性的探究与创新，具有强大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也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进行引导，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负面影响。

4.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局限与互补性

4.1.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各自局限

东方自然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但同时也存在着历史局限，突出表现为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不足，缺乏对人的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东方自然哲学注重对自然的顺应与适应，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的行为应当符合自然规律，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6]。儒家虽然强调人在自然中的“参赞化育”责任，但这种责任更多地体现为对自然的敬畏与维护，而非主动的改造与创新；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强调顺应自然的本性，反对将人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的主体性发挥。

东方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经验归纳与直观体悟，缺乏系统的理性论证与逻辑分析，其理论内容具有一定的朴素性与自发性。老庄思想是对生命本体的直觉式体悟，虽然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但缺乏具体的实践路径与科学的论证方法；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往往过于注重道德规范的约束，缺乏对自然规律的深入探究与技术支撑。这种缺乏主体性觉醒与理性论证的历史局限，使得东方自然哲学在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时，难以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其生态智慧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西方自然哲学以“天人相分”为核心，强调人的主体性与理性思维，推动了技术革新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陷入了对立性困境，过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征服，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西方自然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客体性，认为自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对自然整体联系的忽视，将自然仅仅视为获取资源的工具，而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平衡。

近代西方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进一步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将人类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认为自然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这种价值导向导致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现代西方生态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论虽然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但由于二者都未能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西方自然哲学的对立性困境，反映了其认知逻辑与价值导向的内在缺陷，也为当代生态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4.2.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互补性

尽管东西方自然哲学都存在着历史局限，但二者在当代社会具有鲜明的互补性，东方自然哲学的和谐内核能够修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精神能够弥补东方思想的不足之处，二者的交流互鉴是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关键。

东方自然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和谐共生的核心内核，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与相互依存关系，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和谐内核能够修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为生态保护提供重要的伦理基础。西方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度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客体性，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生态平衡。东方自然哲学的和谐共生理念，能够引导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将人类的活动纳入自然规律的框架之中，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7]。儒家的“敬天畏命”、道家的“道法自然”等思想，能够培养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增强生态保护的意识；佛教的“慈悲为怀”理念则能够引导人们善待一切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

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精神与技术革新能力，能够弥补东方思想的不足之处，为自然利用与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东方自然哲学虽然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但缺乏系统的理性论证与技术支撑，其理论内容具有一定的朴素性与自发性，难以在现代社会大规模推广应用。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思维与科学方法，能够帮助人们深入探究自然规律，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西方的技术革新能力则能够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如环境保护技术、新能源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等的发展，能够有效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修复生态系统。同时，西方自然哲学的主客二分思维与理性还原方法，也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人类的责任与义务，避免东方自然哲学中过于模糊的整体思维可能带来的实践困境。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当代互补，还体现在思维方式的相互借鉴上。东方自然哲学的整体思维能够弥补西方理性还原思维的不足，帮助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对自然的片面认识与过度开发；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思维则能够完善东方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增强其科学性与逻辑性，为东方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方法论支撑。儒家的类比外推思维与西方的逻辑推理思维相结合，能够形成更全面、更科学的认知方式；道家的直觉体悟与西方的实验验证相结合，能够推动生态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5.1. 核心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东西方自然哲学的起源、核心内核、核心差异、历史局限与当代互补性的系统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东西方自然哲学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形成了两条迥异却又相互关联的思想脉络。东方自然哲学以五行论为起源基础，以“天人合一”为核心自然观，注重整体归纳与经验体悟，以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形成了与农业文明相适配的实践体系；西方自然哲学以古希腊伊奥尼亚派的元素本原说为起源基础，以“天人相分”为核心自然观，注重理性还原与逻辑思辨，以利用自然为价值导向，推动了技术革新与工业文明的发展。

东西方自然哲学在认知逻辑、价值导向与实践影响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认知逻辑上，东方强调整体归纳，西方注重理性还原；价值导向上，东方追求和谐共生，西方凸显利用自然；实践影响上，东方形成了经验适配的实践体系，西方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发展。同时，二者也存在着各自的历史局限：东方自然哲学缺乏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肯定，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朴素性与自发性；西方自然哲学陷入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困境，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然而，东西方自然哲学并非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具有鲜明的当代互补性。东方自然哲学的和谐共生理念能够修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为生态保护提供伦理基础；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精神与技术能力能够弥补东方思想的不足之处，为自然利用提供科学支撑。二者的交流互鉴，是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明模式的关键¹。

¹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113086034&from=Qikan_Search_Index

5.2. 当代启示

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核心差异与当代互补性，为构建现代自然观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现代自然观的构建应当立足“天人合一”的和谐内核与“天人相分”的理性精神，实现人类主体性与自然规律性的统一。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东方自然哲学的和谐共生智慧，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准则，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掠夺；另一方面，要吸收西方自然哲学的理性思维与技术创新能力，深入探究自然规律，通过技术革新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实践层面，应当将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智慧融入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既要借鉴东方的整体思维与生态伦理，注重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修复，又要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提高环境保护的效率与效果；在经济发展中，要摒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借鉴东方的适度取用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建设中，要将东方的和谐理念与西方的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社会秩序。

5.3. 未来展望

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化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挖掘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转化路径，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思想方案。一方面，要加强对东西方自然哲学核心概念的深入解读，厘清“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五行”“元素本原”等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避免文化误读与概念混淆；另一方面，要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哲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深度。

在实践应用层面，应当推动东西方自然哲学智慧的具体转化，将其融入到政策制定、法律法规建设、公众教育等各个环节。通过政策引导与法律保障，鼓励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通过公众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与文化素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东西方自然哲学智慧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与文化支撑。

总之，东西方自然哲学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二者的交流互鉴能够为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提供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学思想的思想方案。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和传承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智慧，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自然观，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 [1] 田文军, 李富春. 帛简《五行》篇与原始“五行”说[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3(1): 17-22.
- [2] 马福浚, 刘燕. 东西方自然哲学起源论的差异[J]. 潍坊学院学报, 2013, 13(5): 116.
- [3] 张忠跃. 东西方生态哲学观比较[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12, 31(10): 14-15.
- [4] 孙江. 东西方哲学传统与科学的自然观[J]. 法学杂志, 2009, 30(1): 93-95.
- [5] 李晓琴. 生态环境观的历史演变及经济影响[J]. 当代经济, 2016(22): 84-86.
- [6] 温慧君. 当代生态文明建构路径选择——从技术理性到生态理性[J]. 人民论坛, 2014(5): 40-42.
- [7] 余谋昌. 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2): 112-118.